

ZHONGGUO NONGCUN JIAOYU PINGLUN
ZUIQIN SHIGUANG DE ZHONGGUO JIAOYU



2016-2017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追求平等的卓越机会

邬志辉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NONGCUN JIAOYU PINGLUN
ZUIGUO PINGDENG DE ZHUOYUAN JIHUI



2016-2017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追求平等的卓越机会

邬志辉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2016—2017/ 邬志辉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303-24270-2

I. ①中… II. ①邬… III. ①乡村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845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ZHONGGUO NONGCUN JIAOYU PINGLUN; ZHUIQIU PINGDENG
DE ZHUOYUE JIHU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策划编辑: 陈红艳

责任编辑: 戴 轶 肖 寒

美术编辑: 袁 麟

装帧设计: 袁 麟

责任校对: 段立超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邬志辉

中国 东北师范大学

编委(以字母为序)

白杰瑞

中国 香港大学

范先佐

中国 华中师范大学

哈尔西

澳大利亚 弗林德斯大学

韩清林

中国 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

怀 特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

廖其发

中国 西南大学

雷万鹏

中国 华中师范大学

马尔卡希

加拿大 纽芬兰纪念大学

佩 吉

澳大利亚 新英格兰大学

秦玉友

中国 东北师范大学

任年基

韩国 公州国立大学

桑德韦尔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沙夫特

美国 宾西法尼亚国立大学

谢爱磊

中国 广州大学

杨东平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袁桂林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

张乐天

中国 南京师范大学

朱成科

中国 渤海大学

本辑特邀责任编辑：刘群群 山东省东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China's Rural Education Review

THE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Zhihui W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Members

Gerard A. Postiglion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Xianzuo F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ohn Halsey *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

Qinglin Ha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t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Simone White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Qifa Liao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Wanpeng Le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Dennis M. Mulcahy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Canada*

John Pegg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Australia*

Yuyou Qi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Youn Kee Im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Ruth Sandwell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Kai A. Schaff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Ailei Xie *Guang Zhou University, China*

Dongping Ya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Guilin Yu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etian Zha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Chengke Zhu *Bohai University, China*

The Guest Editor in charge of This Volume: QunQun Liu

总 序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辑刊，主编为邬志辉教授。

辑刊的宗旨是为了提高中国农村教育研究学术水准、促进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而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每辑突出一个主题。本刊的宗旨是面向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大的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与方法观察和研究农村教育，推进规范的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等研究范式在农村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促进以农村教育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生产农村教育新知，服务国家重大决策，改善农村教育实践。辑刊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行动交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全面记录、深刻省思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农村教育，既具有中国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既是中国本土特有的问题，也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国际经验和教训可资中国借鉴，中国经验和教训亦可供世界参考。我们期盼“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道路”和“世界农村教育发展道路”比较与对话，并形成各自的民族教育自觉，坚定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自信和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实践自信，生成本土的教育理论思维与教育实践模式。

其次，是学理性探索与实证性研究兼顾。从事农村教育研究受到的最多批判是“没有理论”。农村教育问题并不是天然地没有理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出现的一大批农村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都有自己的理论，不仅如此，国际上著名的大学者诸如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刘易斯(William A. Lewis)、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也都有自己的农村教育思想，因此本刊重视农村教育理论的生成。同时，我们注重“用数据说话”和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并倡导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可视化处理。

最后，是前沿性问题和最新性进展结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农村教育还面临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反映理论最近进展、总结实践典型经验，实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三重观照是我们办刊的

宗旨，也是本刊的特色。因此，我们特别关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国际组织资助的重大项目的研究进展，并为之提供标志性研究成果的发表。同时，关注学界热点问题及其对热点问题的深度反思。

辑刊分设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调查、学术书评、会议综述等栏目。教育理论栏目侧重于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跨学科视野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反映交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与经典学术观点对话，推动农村教育学术思维的深化。教育政策栏目侧重于对国家已经颁布的重大农村教育政策的评价与评论、对国家拟出台农村教育新政策的建言与提案，关注农村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梳理与分析，同时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最近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与运用。教育调查栏目侧重于反映农村教育真实面貌的调查报告、个案研究，既鼓励运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作深入的时间序列化研究，也欢迎运用自主开发调研工具所做的截面数据调查报告，更倡导运用自主开发的时序化数据库数据进行的研究。学术书评栏目侧重于推介中国学术话语，更以开放的眼光关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内外、教育学科内外相关重要学术著作，推进农村教育学核心概念、支撑性理论的形成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会议综述栏目侧重全景展示和立体反映学术会议的研究成果与思想交锋。学术会议是学者集中发表研究成果、展开学术对话与碰撞、提示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舞台，好的学术会议对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

辑刊拟向下列读者群提供服务：一是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与研究人员；二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与管理者；三是农村各级各类学校、农业院校及普通高校涉农专业的实务人员；四是从事农村教育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五是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的各民主党派、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

本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本刊接受中英文两种语言投稿。来稿原则上是未正式发表或未公开出版的原始稿件。除学术书评和会议综述外，论文长度要求在2万至5万字。作者若有好的选题，也可主动与本刊联系，共商研究与写作计划，以保证本刊学术风格。投稿时请寄纸质文稿1份，同时将电子文本(*.doc格式)发至电邮zgncjypl@163.com。纸质文稿寄至：130024，长春市人民大街5268号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教育评论》编辑部。信封上请注明“投稿”字样。来稿收到，即复回札。来稿采用匿名评审，时间约2个月。如果评审专家评审通过，编辑部将与作者联系。如不拟采用，原稿不再退还，作者若需返还，可来电来函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有权

对来稿作必要的处理，并会与作者联系。

衷心地期盼《中国农村教育评论》能成为你学术研究路上的新朋友、农村教育改革上的新伙伴、农村教育政策制订中的新智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长春

郭志辉

卷首语

农村教育：追求平等的卓越机会^①

过去几十年，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体现为：学前教育快速增长，乡村幼儿受教育机会大幅提高；义务教育逐步普及，国民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家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乡村教师队伍全面改善；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有序推进，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达标率大幅提升；高中阶段教育也正逐步走向普及^②。此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升入大学的农村学生也越来越多。^③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障农村地区学生的学习质量、学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在实现“有学上”之后，再实现“上好学”将是农村教育重要的发展任务。《中国农村教育评论》辑刊一向关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和最新进展，本辑所选取的文章，回应的则是“上好学”的关切。

本辑的第一部分为“精英高校中的农村学生：本土视野”。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所追问的都是精英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成长经历和社会流动体验。作者们将眼光聚焦于高等教育阶段，想要系统地了解对于农村学生而言，上精英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能否借此机会积累各类资本，实现个人的发展——而此又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本辑的第二部分“精英高校中的弱势群体学生：国际比较”则为第一部分的本土研究提供了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弱势学生而言，上精英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又面临着哪些挑战？比较本土与国际同行的研究，既为理论对话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有助于后来的研究人员继续寻找新的研究空白。本辑的第三部分为“教育与社会政策调查”。所选中的四篇文章分别关注的是农村地区教师“县管校用”管理体制改革的留守儿童学业情况、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异地中考政策问题。他们所围绕的核心在于，在一个

① 【基金项目】本辑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 985 高校在校本科生的社会背景与其学业成就和学业体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 13YJC88008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过程视阈下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差异及矫正措施的实证和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71774056)资助。

② 邬志辉、秦玉友:《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Xie, A. (2015). Inside the College Gate: Rural Students and Their Academic and Social Success.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48(2): 77—80.

政策和社会条件都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何从政策、家庭环境以及学校师资方面为农村孩子“上更好的学”做支撑。

本辑的第一篇文章由来自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郑雅君所撰写。2011年左右，在教育部门的有力推动下，我国重点高校开始设立专项名额，面向农村贫困地区招生。这一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重点高校农村学生在数量上的增长。她指出，在持续的社会转型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针对高等教育机会和个人流动机遇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对处于社会流动过程当中的农村大学生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他们在精英高校环境之中适应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作者指出，劣势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其在校表现与教育结果都与优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她据此提出自己的核心问题，家庭背景的影响为何在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存在？家庭背景到底通过何种机制在高等教育阶段继续发挥作用？

通过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她力图从个人在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为个人的发展寻得一个解释，特别重视“习性”（编著注：在郑的文章中，她将 *habitus* 译作“习性”，在本辑的其他文章中，译作“生存心态”）这个重要的解释机制。她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在京、沪两地精英高校开展的个案研究。样本为目的性抽样获得的38位大四毕业班学生，基本的研究方法为深度访谈法。作者按照“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资料分析方法，将研究中的优秀学生分成“掌控型优秀”与“养成型优秀”两类。其中，“掌控型优秀”生，即那些能够“反思性地意识到自己行动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大学这一场域拥有足够多的常识和信息，因而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行动”，积累各种类型资本的学生。而“养成型优秀”生，则是那些“倾向于根据自己固有的文化图式去组织行动，很少在进入大学后形成有意将行动服务于工具性目的的意识，抑或直接将一些习以为常的行动视为上大学的目的本身，却较少反思‘学习’与‘实现向上流动’二者的联系的学生”。后者往往“难以在入学后的短期内树立起一个对自己有意义的成就目标”，作者将其概括为工具理性的“目的失焦”。

作者循着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力图从学生的“社会出身”上寻找这种上大学之后“初始习性”差异的解释性因素。“养成型优秀”生大多来自弱势背景。他们在初始习性上与“掌控型优秀”生的不同大体上可从他们早期的基础教育经历和家庭教养方式上寻得解释。作者还初步地探讨了初始习性上的差异给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带来的不同结果。她以在大一选专业为例，强调“养成型优秀”生“其决策行动并不是在某种中长期理性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而是强烈地受到了外在机会、道听途说和自我臆测的左右”。

本辑的第二篇文章由上海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廖青博士撰写。这篇论文的实

地调研工作是她于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上海的四所精英大学展开的。廖博士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扩招以及近年来重点高校通过专项招生计划提高农村学生比例的现象。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农村学生有怎样的学习体验？对于这些体验，他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回应？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抽象层面，廖博士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生存心态和资本概念来分析农村学生的学习体验。她指出，在考察弱势阶层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时，既需要考虑到阶层位置的改变如何影响到个体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又需要考虑个体在这一过程当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感受。她在上海的四所精英大学以立意抽样的方式选取了32名来自农村较低阶层的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参与者共32位，其中二年级4人、三年级15人、四年级13人。廖博士指出，在大都市中的精英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农村底层的价值观念较少受到推崇。大学场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则，熟悉规则的人如鱼得水，而陌生人则会感到处处碰壁。

来自农村的学生在进入精英场域以后，都体会到了现有环境与以往环境的不同，并感受着阶层的冲击，这种冲击要么体现在城市同学较高的消费上，要么体现在他们流利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上。此外，廖博士观察到，在学业成绩上，研究参与者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一种先跌后升的“V”字型发展轨迹。他们并不认同学习本身的价值，但却深谙好成绩的重要性。在人际交往方面，研究参与者的交友方式较为“随性”，与那些没有读大学的旧友之间关系渐行渐远。在面对新的精英环境时，由于阶层的冲击以及生存心态的错配，农村大学生在内心也有着复杂的情绪反应，夹杂着“低人一等”的羞耻、“盛名难副”的压力、“出人头地”的荣耀、以及回望原来所属群体而产生的“幸存者内疚”等感受。这种复杂情感回应进一步地影响了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使其充满矛盾。廖博士指出，研究参与者所构建的身份认同体现出两个鲜明特征，一为“大城市的‘乡下人’”，二为“来自农村的‘城里人’”。从前者出发时，来自农村的学生时常觉得自己在家庭拥有的资本、自己的见识和能力等方面皆逊色于来自城市的同学；而从后者出发时，他们则会认为自己相比起城市的同学更具向上流动的动力——这是他们建构自身“道德上的优势”的基础。

本辑的第三篇文章由上海交通大学的孙晓凤老师撰稿，研究对象依然为精英高校中的农村学生。她指出，近年来，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多，但他们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时，无法像优势家庭的学生那样从父母那里获得有效指导。在华东地区的一所“985”高校，孙晓凤跟踪调查了13名2014届农村籍大学生，关注了这些学生在大一初期和大二初期理解和看待人际关系的变化。孙晓凤的研究以巴克斯特·马格达的自我主导发展理论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实现自

我主导经历的三个阶段由低到高依次为遵循外部程式、十字路口徘徊和实现自我主导，这三个阶段又可细化为十个区间。

孙晓凤发现，大一初期，农村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处于遵循外部程式阶段；大二时，他们大部分还停留在这一阶段，但更多个体开始意识到服从外部权威的不足，甚至有个体进入听从内心声音的区间。这一结果也吻合美国对低年级本科生的研究结果。在研究中，孙晓凤把人际关系进一步细化为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恋爱关系和对多样性的理解5个层面。她发现，农村大学生在这些不同人际关系的理解上大体一致，也有一些差别。这表明，他们在人际间维度、个人内在维度和认知论维度上的发展并不完全一致。她指出，实现自我主导发展有赖于历经痛苦、重获视角和获得伙伴。高校工作者可以通过在模拟环境中创造挑战，使农村大学生经历痛苦，或积极充当他们的成长伙伴，促使他们进入自我主导发展更高阶段。

本辑所选取的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他们研究探讨了工人阶层子弟在各自国家精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状况。选取这三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比较视野——当我们以类似的理论或者概念框架看待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社会现象时，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吗？

本辑的第四篇文章来自剑桥大学的戴安·雷伊教授。她注意到，在英国，尽管高等教育体系在总体上有所扩张，但工人阶层子弟在其中的比例却在下降——在精英大学尤其如此。在英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文献当中，针对工人阶层子弟“学业弱势问题”的研究是个较为一致的主题。作者则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那些在精英大学获得成功的工人阶层子弟。作者的基本理论来自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生存心态和场域的讨论。她认为，工人阶层子弟进入精英高校学习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当他们来到精英高校的时候，早期的社会化经历——以生存心态的形式反映出来——自然对他们有着深深的影响。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当生存心态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场域时，由此产生的脱节不仅会导致变化和转型，同时也会带来不安、矛盾、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性”。那在作者的研究当中，身处精英大学中的九位成功的工人阶层学生，是否也是如此呢？

作者的发现令人深思，首先，工人阶层的学生在谈及过去生活的社区时，往往提及“如鱼离水”的陌生感——工人阶层本身不重视学业成就，他们的父母甚至不主张他们上大学深造。这就意味着当进入精英高校时，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适应精英环境的文化资本。其次，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陌生感也意味着他们相对地脱离了原先的生存心态，并发展出了新的与精英环境相对匹配的“学习者的生存心态”(Learner Habitus)——极高的学术倾向。“中产阶级的学生都对高等教育这一场域比较熟悉，但对工人阶层的学生而言，他们要应对的则

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场域”。但吊诡的是，这些工人阶级的学生更难适应的是那种工人阶层学生为主的中学教育场域，而非精英高等教育机构。

他们已经发展出极高的学术倾向是这一情形的解释性因素。戴安·雷伊指出，这些工人阶级的学生从较早时期起就要开始处理生存心态与学校教育场域之间的错位。借助于个人的反身性思考，他们个人的生存心态也借此过程得以不断地重塑，并发展出了良好的针对学业的倾向，这为他们在大学学业上的成功提供了基础。

本辑的第五篇文章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助理教授纳森·马丁博士撰写，最初发表于2012年的《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精英高校的学生直接花在学术活动上的时间不断减少。在美国精英大学眼中，一个理想的“大学人”不仅要有优异的学业成绩，更要积极参与校园社会活动。大量的研究也发现，学生在精英大学读书期间参与的校园活动越多，他们对校园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但是，马丁博士发现，很少有研究去探讨阶级出身对学生在精英大学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他们的校园生活满意度有什么影响。在这篇文章当中，马丁博士集中研究了三个问题：精英大学学生的阶级结构、不同阶级学生的校园活动参与模式及他们不同的校园生活满意度。他巧妙运用了两项关于精英大学学生的跟踪调查数据：在杜克大学收集的《校园生活和学习》(CLL项目)数据及在全美几百所高校收集的《合作学院研究项目》(CIRP项目)数据。

通过对多个家庭背景特征做家庭聚类分析，马丁将精英大学学生的阶级出身划分为四个群体，即专业技术阶级、管理阶级、中产阶级和从属阶级。前两个群体同属支配阶级，但专业技术阶级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管理阶级拥有的经济资本更为丰富。后两个群体弱势，但他们通常拥有比蓝领阶级更丰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马丁发现，不同阶级的学生用于学业活动的时间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在学业成绩方面，专业技术阶级的学生最为突出，一方面因为他们入学成绩最优，另一方面因为其父母拥有最多的文化资本。管理阶级的学生成绩介于中产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学生之间，他们对校园生活的满意度也及不上专业技术阶级的学生，因为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比较少。受经济能力及时间限制，中产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学生半工半读的情况更多，他们也无法像支配阶级那样积极加入校内运动队或社团、参加海外游学或与同学聚会。支配阶级两个群体的学生在毕业时满意度较高，与他们积极参与这些校园活动相关。中产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学生半工半读多为生计所迫，这会导致两个群体的校园生活满意度较低。与此相比，支配阶级的学生做兼职多是出于自主选择，因此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大学生活满意度。

马丁认为，布迪厄的社会结构模型综合考虑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注意到了支配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区别，具有其他阶级结构模型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通过运用这一模型，马丁博士不仅发现了专业技术阶级和管理阶级之间在校园生活满意度上的区别，还发现了阶级出身、校园生活参与模式对校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辑的第六篇文章的作者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沃尔夫冈·莱曼副教授，原文发表于2013年的《教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期刊。在加拿大，不利的家庭环境把很多工人阶级子女挡在了高校的大门之外。在幸运升入大学以后，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工人阶级子女也不能像其他学生那样轻易地融入校园生活，并学有所成。在本文中，莱曼关注的是一批特殊的工人阶级大学生：他们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融入了精英大学的校园生活，还学有所成。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所精英大学，莱曼跟踪访谈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工人阶级大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基本从事蓝领工作，没有上过大学。布迪厄认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心态与精英大学的场域格格不入，因此工人阶级大学生升入精英大学后难免感到困惑、矛盾和挣扎。莱曼从布迪厄的生存心态理论出发，研究了这些大学生在精英大学场域中如何远离工人阶级生存心态，培养中产阶级生存心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隐性的伤害。

莱曼发现，为了融入精英大学的社会生活，这些学生不仅要改变工人阶级的外在形象，而且要积累文化资本，培养中产阶级在食物、政治及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品味。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生存心态转变，他们才能学有所成。但是，他们越来越熟悉新生存心态后，就会觉得工人阶级生存心态狭隘、落后。他们庆幸自己能够逃离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实现了父母与自身的愿望，不同程度地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可是，他们的家人和旧友还被困在那里，与这些人日益疏远的关系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代价。莱曼认为，跟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特殊的工人阶级大学生也受到了阶级的隐性伤害。即便在成年以后，他们仍有可能感到，在传统的中产阶级专业技术场域中，自己被视为文化上的外来者。

本辑的第七篇文章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王海纳和邬志辉教授。这是一篇典型的教育政策研究。在本文中，两位作者探讨了教师的“县管校用”政策的实施情况。所谓的“县管校用”政策，是一套新的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其基本要义在于，将教师交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由教育主管部门派出教师到学校任教。这一新政策的目标在于完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更有效地促进城乡教师的有序流动，推动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改进。两位作者指出，作为探索性的努力，地处S省的P县从2013年开始实施这一政策，针对该县的案例研究，应当有利于总结经验并发现问题，为将来的政策执行和完善提供借鉴。他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

P县“县管校用”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执行的环境又如何？相关执行群体和目标群体对该政策又有何看法？该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哪些问题，要如何改进？在研究当中，他们借助了史密斯(Smith)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在方法论上，尽管作者们并未特别言明，其基本的取向应当是案例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他们综合采用了政策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法。他们通过在教育局协助当地负责人处理日常事务的办法进入田野，具体的工作地点为P县四个乡(镇)。接受访谈的人当中，校长10人，教师11人，教育局工作人员6人。他们针对政策内容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关于政策执行效果，他们的核心发现是，这一政策有助于“教育质量均衡”“骨干教师对农村教师的引领和示范”和“优化师资配备”；但问题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走校教师选派规则模糊”“教师考核结果难以量化”“政策执行乏力”，执行主体权力分散，政策内容执行过程中走样，利益群体掣肘政策执行，教师的身份认同冲突，“校长本位意识严重”“激励机制不相容”，关联政策缺位，政策宣传力度低，政府投入有限等。

这是一项严谨的基于本土的教育政策研究，其基本的指向当然是提供对策检验。基于上述发现，他们基本的建议是，在政策文本方面，制定主体要“完善政策文本，细化管理措施”“建立健全合理的教师考核方案”“明确教师走校的有效激励手段”；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要“完善管理机制，补充执行人员”“坚持部门联动，共同推进改革”“消解利益冲突，强化政策执行”；对于相关的利益群体，如教师，要发展他们的职业观念，重视他们的诉求，推动“校长民主管理”；在政策执行环境方面，一要“健全配套制度，明确法律保障”，二要“实施省级统筹，保障教师待遇”。

本辑的第八篇文章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贾勇宏博士，他对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多年。在本文中，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留守儿童的父辈与他们的亲子互动状况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这又对他们的学业与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他所分析的数据来自2006年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该项调查涉及湖北省的钟祥市、沙阳县、长阳县，河南省的罗山县、长葛市、襄城县、禹州市，安徽省的濉溪县和潜山县。样本来自这些县市的62所中小学，接受调查的学生超过4500人，教师超过3300人。贾博士的数据分析表明，总体上，留守儿童的亲子互动特征可概括为“遥控监护”，即亲子沟通以电话联系为主(超过93%的留守儿童通过打电话与父母沟通，月均3~4次以上，每次通话4~20分钟)，沟通内容多涉及学习和安全。关于通话对留守儿童学业及心理健康等的影响，作者也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他指出，亲子互动越多，也就是父母与孩子电话联系的频次越多，留守儿童的成绩整体上就越好。主要表现为，对孩子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有显著影响。不过，作者又指出，联系的频次对语文成绩、道德品行、心理健康、学习兴趣、组织纪律

和自理能力的影响，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作者提醒读者注意，以上研究结论是在 2006 年的调研数据基础上得出的，时隔 10 余年，留守儿童父母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通信、交通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将会更加便利，亲子沟通的频次、形式和内容也都有较大的变化。在调研的基础上，作者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增强留守儿童父母的监护主体责任意识”“加强亲职教育，对留守儿童进行必要的教育指导”，调动各种社会公益力量，拓展留守儿童亲子互动的渠道，转变务工方式，创造亲子互动的良好环境与条件。

本辑的第九篇文章由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张文斌博士和周晔教授撰写。这篇文章关注的同样是农村教师。作者们指出针对农村新教师成长的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农村新教师的专业发展影响着农村学校以及农村教育的未来。他们以农村新教师的专业生活为题，采用的是质性研究设计思路，在总体设计上则为叙事研究取向。他们的研究对象是 2015 年进入西部某校的一位新教师 Z，基本的数据收集方法是访谈法和观察。他们关心的是，作为该校 2011 年以来进校的唯一一位教师，他如何从一位“菜鸟”逐渐成长为乡级“优秀班主任”，他的专业生活内容有哪些变化。

结合 Z 教师的叙述，作者们将其专业生活分为“适应与摸索”“成长与胜任”“冲突与转变”三个阶段。他们充分地结合叙事研究的长处——深度描述，对 Z 教师经历的这三个阶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发现填补了既往研究的不少空白。比如，他们指出，新教师的适应，不单单指其专业上的适应，如讲课与备课，还包括了在中观上对组织环境的适应——从学生变为下属、同事与管理人员。作者们还指出了农村教师在职初面临的一些独特挑战，如缺乏培训，没有集体备课机制。另外，对于新教师的发展而言，学校组织环境重要，更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重要。如 Z 教师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包括学校不重视教师学习、教师群体也缺乏主动学习的氛围。

这是一篇有政策关切性的调查文章，作者们除了对 Z 教师的专业生活进行描述之外，还对其专业成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具体问题，他们归结为“教学生活穷于应付”“学习生活内容单一、低效”，缺乏教师教研。据此，作者们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做好社会支持，提升教师专业情意，提高他们学习生活的质量，创造条件，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

本辑的第十篇文章由来自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王向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吴子劲所撰写。这也是一篇教育政策研究。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招生实行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基础的配额制度。这一制度又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户籍不在某省的考生没有在该省参加高考的资格。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随同父母在外地上学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多。2012年，国务院发文主张逐步放开异地高考，但具体实施办法仍由各省自行制定。各省的异地高考政策通常规定，外省学生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前提之一是要在该地就读高中。由此，各地市的异地中考政策事实上成为了限制跨省高考的一道屏障。

从教育公平的视角，王向和吴子劲审视了广州的异地中考政策。通过分析广州市有关异地中考的政策文本，他们指出，广州市不再简单粗暴地限制户籍在外地的学生在广州市参加中考。在某种程度上，这本应有助于外地学生获得与本地学生一样的进入广州公立高中的机会。然而，通过检验该政策的实施结果，他们发现，这一政策实施以后，外地学生进入广州市公办高中的整体机会在减少，他们进入广州市示范性高中的机会更少；在进入公办高中的入学机会上，他们与本地学生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广州市对外地学生进入公立高中实行了限额，即在每年公办高中的招生名额当中，户籍不在本地的学生只能占到8%。在异地中考政策实施以前，外地学生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进入公办高中，但他们事实上能够获得比这一比例更高的进入公立高中的机会。王向和吴子劲指出，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广州市政府所“提出的教育公平内涵存在局限以及隐蔽的负面影响”，因为其“不重视增加或维持”外地学生“实际获得的教育机会”，或者没有着力于消除外地学生与本地学生在进入公立高中方面的机会差异。

近些年，针对高等教育系统扩张和个体受教育机会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对处于社会流动过程当中弱势群体学生体验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他们在精英环境中适应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习机会是来自较为弱势的社会群体的学生实现转变的重要机遇。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新的视角，深入微观过程，探讨来自弱势社会群体学生的社会流动体验，并进而探讨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他们个人生命历程之间的互动关系^①。本辑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研究探讨的都是精英环境中弱势群体学生的社会流动体验，可算前沿性质的研究。它们大都基于较为扎实的质性研究设计，也都有着坚实的学科文献基础，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这六篇文章的选取，可算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入门基础和前沿梳理，也在方法论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借鉴。

本辑第三部分的4篇调查关注都是当前农村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例如，它们都基于扎实的社会调查，有着较为系统的研究设计，既有案例研究取向的研究，也有定量的调查和质性的叙事研究。当前，农村教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推动农村学生上好

^① 谢爱磊：《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社会流动与生存心态的转变》，《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第74~81页。